

中國之日本研究現況

----中共政權成立以降----

林賢參

國家安全會議助理研究員

2009年9月24日日本研究中心成立研討會

一、前言

2007年11月，曾經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之資中筠，在中共中央黨校所屬《學習時報》撰文指出，中國人無法擺脫中國是日本文化源頭自居的心態，乃是中國對日本研究始終不甚發達的原因。資中筠歸納出以下三項阻礙近現代中國的日本研究正常發展之負面特徵，亦即情緒化、把日本作為「二傳手」、泛政治化和高度實用主義。¹前者是指，對日研究受到日中關係影響，關係好時，多看優點，視為學習典範，關係惡化時，則儘看缺點，如果有人提倡要認真研究日本，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引起反感，把「知日」視為「親日」，甚至視為漢奸賣國賊。有關第二項特徵，是指中國留日學生，透過日本學習歐美現代化知識，但卻少有把日本本身作為研究對象。至於第三項特徵，則是可以用來形容改革開放政策啟動後之日本研究狀況。儘管日本是位居亞洲之首的先進國家，但中國人的關心焦點，卻只在日本的經濟領域。另一方面，也有學者指出：自黃遵憲、戴季陶以來，在中國已少看到研究深入的日本論，中國各界不僅對日本的歷史、思想、文化沒有深入的瞭解，對現代日本也缺乏正確的認識。²

194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政權成立以來，在一黨專制、以黨領政的政治體制下，共產黨支配包括學術研究在內的一切，屬於社會科學領域的日本研究亦不例外。具體而言，日本研究被視為國家計劃之一環，不管是研究目標或方法，都會受到國家對外戰略之影響。本文即立足於此一觀點，探討中共政權成立後，中國的日本研究概況。

「日本研究」之定義，依據不同研究取向，可分成以下三種類別。第一，以人文科學傳統的文化研究為取向的「日本學」(Japanology)；第二，人文與社會科學間的科際整合性研究，稱為「日本的研究」(Japanese Studies)；第三，以社會科學領域為中心的現代「日本研究」(Japan Studies)。³而本文之論述，則以第

¹ 資中筠，〈日本“知華”與中國“知日”的差距〉，《學習時報》，第413期，〈http://big5.china.com.cn/xsbs/txt/2007-11/27/content_9303656.htm〉。

² 李曉東，〈“妖魔化”現象與中日關係之省思〉，《中國大陸研究》，第50卷第1期(民國96年3月)，〈<http://iir.nccu.edu.tw/attachments/journal/add/2/u51-6.pdf>〉。

³ 徐興慶，台灣的日本研究與台日關係未來之展望，「台灣日本研究學會」2007年度會員大會(2007

三項為主。

二、日本研究發展過程

日本研究之時期區分

在地理上處於一衣帶水的日中兩個鄰國，已經擁有千年以上的交流歷史。不管是為克敵制勝，或者是為友好交流，基於知己知彼的考量，以對方為對象進行研究，乃屬必然。根據日本法政大學教授王敏之分類，中國的日本研究，可區分為以下五個時期：⁴

- 第一， 從古代到元朝滅亡(~1368年)。西晉時代陳壽所著『魏志倭人傳』，係中國現存對於古代日本研究之最早的紀錄（約成書於3世紀後半，280年~290年間）。此一時期之日本研究，大都是該書作者觀點之延續。
- 第二， 明代(1368~1661年)。當時由於受到倭寇入侵騷擾之故，如何因應倭寇，即成為明王朝對日政策之重點，也因此展開多元的日本研究。與前期相比，此時期已經出現根據實際考察之日本研究。
- 第三， 清代至國民政府時期(1662~1930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一役，敗在被其視為追隨者日本之後，即認識到日本現代化與洋化之成功，並因此而開始展開洋化運動。其中，有部分有識之士為了透過日本管道向西洋學習，而造就了日本研究領域更為深化之結果。
- 第四， 中日戰爭前後(1931~1948年)。由於日本對中國展開帝國主義式的侵略，導致平穩的日本研究氣氛瓦解，轉向以帝國主義日本為主題之日本研究，蔣百里所編著的《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可說是當時中國的日本研究之代表性著作。
- 第五，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迄今(1949~現在)。中共政權成立後，由於受到國際社會之美蘇兩極冷戰，以及國內之「反右派運動」、「文化大革命」之影響，導致中國大陸之日本研究活動，幾乎陷入停頓、甚至消失之狀態。1970年代以降，歷經與日本建交，以及改革開放政策之啟動，才讓日本研究重新開始，並呈現出未曾有過的活絡現象。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金熙德指出，近現代中國的日本研究，出現過三次高峰期。⁵第一次高峰期，出現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由於日本明治維新成功地達致「富國強兵」，並擠身帝國主義列強之林，此一成功模式成為當追う

年1月5日)專題演講稿，註解2。本演講稿係徐興慶教授提供筆者參考，謹此致謝。

⁴ 王敏，〈中国における日本研究の新しい動き〉，《世界週報》，2003年7月8日號。

⁵ 金熙德，〈中国における日本研究と対日政策〉，《浙江工商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http://www.zdrbs.com/japanese/paper/ch/05> 金熙德(対日政策).pdf〉。

時清末民初政府官僚與民間有識之士學習研究的對象。同時，由於日本侵略中國，基於「師夷長技以制夷」構想，日本軍國主義之發展，也成為研究主題。至於第二次高峰期，出現在 1970 年代末，研究的對象，則除了明治維新之外，再加上戰後日本復興之模式，研究的領域則以經濟為中心，其次為外交與政治。1990 年以後，一直到現在，則屬於第三次高峰期，不論是研究機構或研究人員，均屬於最多的時期，研究主題則是對過去成為中國學習典範的日本模式之反思，並且加重對日本政治外交與日中關係之研究。

毛澤東執政時期之起伏

毛澤東政權初期之 1950 年代，對外採行向蘇聯一邊倒政策，加入蘇聯社會主義陣營，以對抗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1950 年 10 月，中共派軍介入由蘇聯在幕後主導的韓戰，與以日本為基地之美軍展開激烈對抗，也因此導致中共無緣參與舊金山對日和約，失去與日本建立關係之契機。

1952 年初，中共總理兼外長周恩來提出「民間先行，以民促官」構想，企圖打破對日關係僵局。同年 5 月，周恩來召集知日派人士開會，在政府內部成立對日工作領導班，並委由知日派大老廖承志負責，籌畫如何開展對日工作。由於 1954 年 12 月成立的日本鳩山一郎內閣，積極尋求改善與中蘇兩國關係，北京之對日政策主軸，亦隨之由打倒美日反動派，轉換為追求與日本關係正常化。1955 年 3 月，北京當局制訂「關於中共中央對日政策與對日工作方針與計劃」後，於同年 12 月在國務院設置對日工作委員會與對日工作班，以推動對日工作與日本研究。⁶

1957 年 2 月，岸信介內閣成立，明確表達支持臺灣之態度，讓北京尋求與日本官方直接接觸之希望落空。不過，周恩來並未放棄努力，仍然持續堅持其「以民促官」之民間外交路線。1963 年底，在毛澤東指示下，北京當局公布「強化外國研究」方針，並且在翌年 2 月，發出「關於在大學設置外國研究機關之指示」，要求相關機關加強包括日本研究在內的國際關係研究之具體措施。根據此一指示，在日本侵華期間遭到日本佔領的東北地區，隨即於 1964 年 3~9 月間，先後在遼寧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吉林大學、東北師範大學等院校設置日本研究所(室)。同一年當中，陸續在北京的中國科學院(今之中國社科院)、北京大學、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河北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天津市歷史研究所、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等，分別設置日本研究專門機構。翌年，中國現代國際問題研究所東亞研究室，亦成立日本研究組，作為官方對日政策研究之專門智庫。⁷

根據前述王敏之論文，中共政權成立以來，迄 1965 年為止，中國出版有關

⁶ 林昶，〈中國的日本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http://ijs.cass.cn/files/rbz/z8.htm>〉。

⁷ 王敏，〈新中国における政府主導の日本研究の一考察 ——国家システムの一環という特殊事情——〉，《AAN アジアネットワーク》，<http://www.asahi.com/international/aan/haiken/haiken040531.html>。

日本研究之書籍，共計 13 個領域、252 冊。該等書籍幾乎是翻譯或者是只停留在介紹的程度，而且是反映北京當局配合蘇聯對日政策，偏重於反美或反日之時事政策評述。此等日本研究之內容，剛好反映出當時北京當局的日本觀與日本研究之實際狀態。在毛澤東指示下，中國之日本研究再現曙光。不過，乍現之曙光，卻又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而消失，再度讓日本研究陷入低迷、停滯狀態。根據統計，從文革前半期 1966~71 年，中國大陸所發行有關日本的書籍只有 4 冊，其中 3 冊為非學術性的編譯資料，另 1 冊是供批判用的翻譯小說。⁸

「大平學校」與「北京日本學中心」⁹

1972 年 9 月 29 日，赴北京訪問之日相田中角榮，與北京當局發表《中日聯合聲明》，雙方建立外交關係，為中國之日本研究重燃生機。1979 年 12 月 5 日，日相大平正芳訪問北京，承諾提供政府開發援助(ODA)給中國，其中包括在北京語言學院內設立「日語教師培訓班」(通稱:大平學校)之 5 年援助計劃，協助中方訓練日語教師，以促進兩國間之相互理解。而北京當局強化國內日語教學，乃屬於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之一環，在此一國家戰略指導下，包括選派留學生赴日留學「取經」、強化本國日語師資的培育工作，即成為第二波日本研究高峰期的重心。

1980~84 年，在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主導協助下，日方每年提供 2 億日圓經費，透過派遣日籍教師、購贈圖書教材、招募研修生等方式，5 年間共協助中方培訓 600 名日語師資。1985 年 9 月，日方應中方要求，在國際交流基金會與中國教育部共同主導下，將「大平學校」援助事業移轉至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在之北京外國語大學)，新設「北京日本學中心」，以及制定第一次 5 年計劃，除了原先之日語研修課程外，另開設以培養日語教師與日本研究專門人才之研究所碩士班，共有語言、文學、社會、文化等四個學程。中心設立之同時，專供日本研究之圖書資料館也一併設立。自此以後，「北京日本學中心」不但成為培養中國之日本研究專門人才的搖籃，也是日本研究學界重要的交流平台。

1990~95 年，在「北京日本學中心」第二次 5 年計劃期間，日方再度應中方要求，另外在北京大學設立「現代日本研究講座」，招收具有碩士學位以及擁有同等學力之年輕實務工作者，施以為期一年的研修課程，以培養研究現代日本之專門人才。其後，日方希望將「北京日本學中心」發展成為在中國的日本研究之教育與研究據點，再度新設「客座教授·客座研究員制度」以及「博士課程進修制度」，以培育超越日語教師之高級日本研究人員為目標。在此基礎上，歷經第三次、第四次 5 年計劃的 10 年期間，「北京日本學中心」成為中國培養日本學領域的研究人員、大學日語教師和各個部門專門人才的重要據點，提供中國的日本

⁸ 同註 6。

⁹ 以下有關「北京日本學中心」論述，無特別註釋部分，參閱:北京日本学研究センター事業概要，《國際交流基金會》，<http://www.jpf.go.jp/j/intel/study/support/bj/pdf/details.pdf>。

研究學界之研究和交流的環境。

此外，1999年7月，在北京舉行的日中高峰會談中，雙方為促進日中兩國在知識領域的交流，達成由日本提供無償資金(8.51億日圓)援助，以擴充「北京日本學中心」的軟硬體規模之共識，期待該中心能夠發揮日本學研究之核心角色，以促進日中雙方之相互理解與知識交流。¹⁰

其次，2005~09年第五次計劃期間，為因應中國社會之快速發展，以及國際交流基金會之體制變更——獨立行政法人化，提高「北京日本學中心」在運作與教育層面之自主性，成為日中雙方努力的目標。為此，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實施部分，將原碩士班四個學程與日語教師在職進修碩士班加以統合，並加入經濟領域後，新編成「日本語學・日本語教育學」、「日本文學・日本文化」、「日本社會・日本經濟」等三個學程。其次，在北京大學實施部分，則將其改稱為「北京大學現代日本研究中心」，除了繼續原有的教育功能外，將強化日本研究活動以及將研究成果予以普及化之功能。

在日方援助以及中方自行努力下，中國的日本研究經過將近30年期間，已經發展成為與美國研究並駕齊驅的單一國家研究領域。根據「北京日本學中心」與「中華日本學會」所作的聯合調查，截至1990年代末，中國共有103所日本研究機構(其中日語教研機構29所)，其中，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吉林省社科院日本研究所、遼寧大學日本研究所、遼寧省社會科學院、河北大學日本研究所、東北師範大學日本研究所、吉林大學日本研究所、天津市現代日本研究所、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等研究機構，建置完備，歷史較長，基礎較雄厚，是當代中國日本研究之主要力量，同時也扮演官方智庫角色。此外，有關提供日本研究人員交流平台的學會，全國共有217個日本研究學會。其中，成立最早的是全國日本經濟學會，會員近400人；而規模最大的是中華本學會，擁有1500多名會員。至於從事日本研究與教學人員，約有3000人。¹¹

三、日本研究之特徵

毛澤東執政的1950-60年代，在美蘇兩極冷戰狀態下之日本研究，置重點於批判戰後日本國內的保守派政治動向，以及美國扶植日本充當冷戰前哨戰之對日政策，可歸類為敵國研究。因此，當時的美蘇兩極冷戰對峙局面，完全反映在北京當局的對日本研究，其研究內容大都基於馬列意識形態出發，亦即從反資本主

¹⁰ 外務省，〈中国の「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センター拡充計画」に対する無償資金協力について〉，平成13年8月3日，〈外務省〉，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data/zyoukyou/h_13/010803_1.html。

¹¹ 同註6。

義與反帝國主義的觀點，對美國的對日政策，以及以美國馬首是瞻的日本執政當局進行批判。

其次，自 1970 年代末以降，以迄於現階段，如同前節所述，在日本政府援助下，中國大陸之日本研究，共經歷兩次高峰期。在此期間之日本研究，其研究特徵與新動向，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實用主義與功利主義

清末民初以來的日本研究，是將日本作為尋求中國現代化發展之資訊來源，而日語則是吸收該等資訊之必備工具，因此衍生出將日語研究與日本研究畫上等號之誤解。在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以及日本政府援助下，為近現代中國之日本研究捲起第二次高峰期。為配合改革開放政策之需，如何將戰後日本復興之成功模式作為中國改革開放之學習典範，成為最重要的研究課題。根據統計，從 1979 年改革開放政策啟動後，一直到 1993 年 3 月期間，全國出版有關日本研究書籍共 3157 冊，為 1949~78 年出版書籍的 17.5 倍，創下中國人研究日本歷史上年平均出書之最高紀錄。其次，由於受到功利主義之影響，有部分研究者捨基礎研究，集中在研究成果容易發表，並且吸引注意的現實議題上。換言之，研究主題出現從純學術性研究，轉換到現實性的政策研究。

政治主導

中共政權成立以來，在中國之日本研究，是基於為政權服務才再度被重視，因此，北京當局之意向是無法被忽視的，尤其是政治領域之研究，必須完全服從於國家戰略之需求，形同是國營事業。依照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之分類，日本政治領域之研究，可分為內政、外交安保、以及歷史等三個領域。只要研究體系仍處於國營或半官半民狀態，純粹的個人研究便難以獲得肯定。¹²例如，中國最具規模的官方智庫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即直屬國務院，而其他如外交部所屬智庫國際問題研究所、國安部所屬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以及各地方政府所屬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等，都是在官方主導下進行政策研究。

研究主題多樣化

研究主題從限定於與中國有關之日中交流議題，擴大至現代日本社會之多樣化主題。在早期之日本研究主題，除了作為學習典範的明治維新外，大都限定在與中國有關、諸如兩國在古代的交流關係史、文化關係史等，以及近代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軍國主義等之研究。但是，近年來此一研究傾向已出現變化，日本社會所出現的各種現象，例如高齡少子化、社會福利與醫療保險制度、以及經濟泡沫化等，也成為研究關心的焦點。此外，有一項值得注目的變化是，在有關日本經濟之研究領域，研究內容已經從學習過去日本經濟成功的經驗，轉變為如何

¹² 同註 7。

從日本經濟泡沫化中汲取失敗的教訓。

與區域研究相結合

現階段的日本研究主題，不只限定於日中雙邊關係或日本國內之政治、經濟或社會文化等，而是將日本置於亞太區域或全球架構下進行解析，主要是集中在與美國全球戰略(如反恐與反擴散)，或亞太戰略相關聯之東北亞區域政治、安全以及經濟等有關議題。例如，近年來，有關北韓核武開發所引起的東北亞區域緊張情勢，美國將全球防衛戰略部署重心由歐洲轉移到亞太區域，以及國際經濟合作、東亞共同體形成過程中，日本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角色演變等，都是熱門的研究主題。

研究型態之三階段演進

誠如前述，在初期階段，中國的日本研究人員，只是單純地透過翻譯，「介紹」日本人之研究成果或日本現狀，鮮有自行研究的探討性文獻；1980年代後半，中國學者獨自的研究成果變多，但是，從方法論的觀點來看，不可否認的是，「模仿」日本人的研究仍然是主流；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具有「獨自性」的日本研究才逐漸出現，真正的日本研究才開始成形。¹³

四、對日關係新思維與外交革命

如同前述資中筠所言，中國的日本研究是與日中兩國關係變化緊密聯繫在一起。當日中兩國關係好時，視為友邦，當關係惡化時，則儘看缺點，而且是以放大鏡來觀察。誠如韓國李承輝之研究指出，在中國大陸的所有學術研究都受到政治之影響，但是，在日本研究領域，其所受到之影響顯然已經過度。¹⁴

近年來，在日本研究學者間，出現如何認識日中關係之現狀，以更理性的態度思考、建構新的日中關係之現象。於2001年4月組閣之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為兌現競選自民黨總裁政見，每年赴靖國神社參拜，再度突顯出歷史認識問題在日中關係之重要性。

正值日中兩國建交三十週年紀念之2002年，《人民日報》資深評論員馬立誠以遊記見聞和史料回顧的方式，在《戰略與管理》雙月刊，發表題為「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文章，呼籲各界重新審視日中關係。馬立誠認為，如果放任兩國敵對情緒加深，很可能導致日本的排外主義以及反中情緒高漲，進而

¹³ 徐一平，〈中国における日本研究・日本語教育の現状と展望〉，香港日本語教育研究會，<http://www.japanese-edu.org.hk/yoshitsu.htm>，

¹⁴ 李承輝，〈中国における日本研究〉，《浙江工商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http://www.zdrbs.com/japanese/paper/jp/02_李承輝\(中国の日本研究\).htm](http://www.zdrbs.com/japanese/paper/jp/02_李承輝(中国の日本研究).htm)〉。

引發兩國關係之惡性循環。因此，馬立誠提出把歷史問題放在次要位置的「對日新思維」。¹⁵文章發表後，引起學術界以及輿論一片嘩然，使他成為眾矢之的。翌年4月，也就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二十五週年紀念，在中國國際關係學界頗具知名度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弘，也在《戰略與管理》上發表「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論文，針對馬立誠所提出的「新思維」進行系統化的闡述。¹⁶同樣地，時殷弘論文也引起很大的迴響，有理性的支持與反對，更有鋪天蓋地情緒性的激烈撻伐。

馬立誠文章，在批判中國一部分過於情緒化的極端民族主義之同時，呼籲中國社會應正確看待日本主流社會的和平發展，面對日本今後可能成為政治與軍事大國趨勢時，應該「要把日本恢復正常國家軍事狀態的軍事訴求，同重新恢復軍國主義發展道路區別對待」。而時殷弘文章則主張，中國為謀求中日接近，可以採取包括擱置歷史問題、平衡日本經濟需求、不動輒批判日本走軍事大國道路、加強與日本之政治經濟合作、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五項措施。

馬立誠與時殷弘之主張，雖獲得日本媒體與中日關係研究學界極大的迴響與好評，但是中國大陸對渠等主張之討論與評價，卻呈現一邊倒的現象，譴責與漫罵之聲不絕於耳。《人民日報》日本版鑒於網友對此議題反應頗為激烈，有意邀請日本研究學者發表意見，但找了不少學者，都不願意出面討論此事，有學者甚至以「不值得一駁」做為回應。而接受訪問的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金熙德表示：新思維最大的缺陷，就是脫離了當前日本的現實，以及中日關係的實際面，並且過於低估了日美同盟的牢固性，低估了美國控制日本的能力和日本追隨美國的意志，低估了日本防範中國心理，低估了日本鷹派勢力的能量，低估了歷史問題的複雜性。¹⁷其後，金熙德與《人民日報》評論員林治波共同執筆，在日本出版『所謂日中「新思維」係何指？對於馬立誠、時殷弘論文之批評』¹⁸（原文為日語）一書，將對於馬、時之筆伐戰場移轉至日本。金熙德在該書中表示，馬、時二人皆非日本問題專家，渠等論述只能視為野人獻曝。此外，《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卓南生則表示：「我們這些研究日本的人根本不屑一看，因為其立論過於幼稚」。¹⁹

相對於日本研究學者之批判，國際關係學者反而撰文支持馬、時兩人的立論。例如，南京國際關係學院周桂銀即撰文為馬、時二人辯護表示，對於在傳統意義上，負有先知先覺使命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中日關係的新思維與外交革命問

¹⁵ 馬立誠，〈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6期，頁41-47。

¹⁶ 時殷弘，〈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2期，頁71-75。

¹⁷ 孫亞菲，〈對日需不需要“新思維”？〉，《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BIG5/guojj/1030/1913189.html>〉。

¹⁸ 馬立誠，時殷弘，〈日中「新思考」とは何か 馬立誠・時殷弘論文への批判〉，日本僑報社，2003年。

¹⁹ 卓南生，〈出口轉內銷的日本“新思維”——與吳學文教授對談(三)〉，《人民日報》日本版，〈<http://japan.people.com.cn/2003/5/13/2003513144923.htm>〉。

題上，表現出如此缺乏理解與理性的態度感到驚訝，渠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應出中國相當部分國民不成熟的對日心態，而這也證明對日新思維與外交革命之必要性與迫切性。²⁰

其次，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劉傑，在與北海道大學教授高井潔司對談此問題時表示，對日新思維之所以遭到中國的日本研究學者強力批判，主要原因在於擱置歷史認識問題的主張無法被接受。因為，歷史認識是日本研究的重點議題，並且是形成對日政策的基本，如果日本研究學者之歷史認識被推翻，對日政策就必須面臨從根本上之修正。劉傑一針見血地指出，只要中國的日本研究仍然受到民族主義所左右，仍然只依賴中國的歷史文獻進行研究，中國的日本研究學界就不可能提出對日關係之新思維。²¹

五、結語

日中兩國關係的發展過程中，站在第一線的日本研究人員或知識分子，負有提供正確資訊的重責大任。因為他們的研究成果或對日本的認識，不但能夠提供當局決策參考，也是一般大眾了解日本的重要資訊提供者與解讀者。中國的日本研究，在北京當局改革開放政策以及日本援助下，已經開創歷史新的一頁。不管是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以及發表的研究成果之數量，都是前所未見的。但是，問題在於研究內容是否能夠正確反映日本真實的一面，或者是主流的價值觀與態度。

中國輿論界與日本研究學界對馬立誠、時殷弘兩人之圍剿，以及 2005 年 4 月中國大陸各地大城市所掀起的反日活動，反映出有不少包括日本研究學者在內的中國民眾，仍然以二次大戰以前的眼光，或者是抓住少數右翼言論，就以偏概全地看待日本，完全無視於日本社會在戰後的和平發展狀態。對此，時殷弘論文即批判地指出，由於媒體報導和研究工作的重大缺陷，才會導致一般中國人對於日本公眾對中國之情緒與看法，連同其日本國內政治影響，幾乎完全缺乏了解。但是，有一個關鍵因素，時殷弘並沒有點出，亦即，中共政權的角色扮演。

在一黨專政的中國，不管是媒體報導或對日研究，都必須服從於北京當局所制定的國家戰略目標，再加上有關歷史研究素材，都是中共意識型態主導下的官方版「正史」，即難以期待日本研究學者能夠超脫官方所訂製的框架。而由不屬於日本研究學界的政治評論員與國際關係學者，提出對日新思維與外交革命，突顯出日本研究學者受制於意識型態的困境，或者是怯於突破現狀的怠惰。

²⁰ 周桂銀，〈理解對日“外交革命”〉，《戰略與管理》，2003 年第 4 期，頁 18-22。

²¹ 劉傑，高井潔司，〈〈新春対談〉中国の対日“新思考”論争が意味するもの——論争は日中新時代のプロローグ〉，《中野県日中友好協会》，〈<http://www.avis.ne.jp/~nihao/04sinsyun-taidan.htm>〉。